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及其中国问题

□姚文放

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

“话语转向”，这是近年来在社会知识中发生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也是近年来文学理论发生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20世纪文学理论在“语言学转向”的总体背景下经历了“形式转向”与“话语转向”两个阶段，前者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为代表，而后者由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等新潮理论唱主角。如果说前者的主旨在于研究语言形式本身的话，那么后者的要义则在于寻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的实际状况对于话语的构成和运用的制约作用，它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更是深藏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可见话语是语言但又超越了语言，“话语转向”生成于“语言学转向”，但最终对“语言学转向”实行了消解，这种超越和消解标志着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了历史主义。

对于话语理论作出最大贡献的，当数法国学者福柯。20世纪60年代末以降，福柯的话语理论经历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方法论演变，对于知识话语、权力关系、身体话语、微观政治等问题进行了开掘和建构。福柯的话语理论表现出一种强烈诉求，力图为话语问题提供一种制度化的背景，一种权力关系的基础，在制度化、体制化的层面上将话语视为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表征，并形成一种特定视角，在话语问题上打开一条通往历史、社会、政治、文化的路径。而这一切对于晚近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向”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为审视中国当代文论的话语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眼光。

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

世纪之交，话语理论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那就是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争论。最早是曹顺庆在1995年提出了这一问题，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有人将这种西律中式的套用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失语症。试想，一个患了失语症的人，怎么能与别人对话！”这本来是一篇对于文学理论现状进行反思的文章，由于后来季羡林先生参与了讨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遂成热点。其中的核心在于如何着手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意见也很是分歧。

以上关于中国文论“失语”与“话语重建”问题的讨论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共同之处，即基本上未涉及话语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等问题，虽然讨论后期也有学者关注到相关问题，也试图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加以阐释，但总体上并未深入到文学理论话语的深层问题作进一步的审视和考量。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代以来中国文论一直致力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从未停息，从未懈怠，一批又一批的有识之士在新知与旧学、现代与传统、域外与本土、高雅与通俗等多种力量关系之间作出抉择、寻求出路，推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的事业，在若干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树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如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学洗礼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等对于“新学语”的吸纳和输入；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五四弄潮儿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对于白话文学的倡导；30年代左翼文学对于苏联及日本左翼文学的文论观念的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观念的发展和“两结合”的提出；新时期文论向文学审美本质的回归及新方法的引进；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激发了文学理论话语的本土自觉；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之势造成理论话语的蜕变与更新；当前网络话语的爆炸对于文学理论话语的渗透和浸润等等。总之，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其中种种历史语境的转换和权力关系的博弈都会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及时得到回应、引起反响。

“关键词批评”的历史主义取向

这里不可能对近代以来中国文论每一次话语嬗变作出逐一分析，只拟对于近来迅速崛起的“关键词批评”进行分析。

毋庸置疑，“关键词批评”现已成为风靡一时的文化风尚和文学热潮，自从1990年代中期“关键词”概念进入中国以来，已经成为知识界、读书界普遍的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人们甚至到了“言必称关键词”的地步。如果从学术层面上来说，它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之大绝不逊于上述任何一次潮流，特别是它是以话语概念为标帜的，此前只有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与之略同。而它所及之处谓之“语词爆炸”毫不夸张：文学理论的著作称“关键词”，丛书称“关键词”，刊物专栏称“关键词”，研究论文称“关键词”；研究领域中文学作品有“关键词”，文学类型有“关键词”，文学流派有“关键词”，文学史有“关键词”，文学新学科有“关键词”。如果打开“中国知网”搜索一下，那么“关键词”就无所不在了。其中应予重视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关键词”的研究著作。

那么，“关键词批评”为何引起如此之高的关注度呢？看来还是要回到事情的源头去探究原因。1976年，伯明翰学派的领军和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出版了《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该书在1990年代中期影响我国学界，《读书》杂志最先将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及其研究方法介绍过来，汪晖在该刊1995年第2期发表了《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文章力图彰明的正是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批评”的历史主义取向。随之《读书》杂志开辟专栏，组织了多期讨论关键词的专文，后来又波及其他出版物，一时间“关键词批评”搅动了整个学界，以至在十数年间国内学者对此热情不减。至今“关键词批评”在中国已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回顾以往，就文学研究而言，总体上是对于“关键词”的梳理和提炼多，对于“关键词批评”的总结和反思少，偏于将“关键词”作为一种操作方法来使用，而对于“关键词批评”推动观念变革的精髓把握不力。因此从中国文学理论重建话语体系着眼，进一步寻绎“关键词批评”的渊源和学理，以期得其精髓、扬其精神，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雷蒙·威廉斯将他的“关键词批评”称为“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 semantics），其中始终浸润着福柯的精神，威廉斯接受过福柯的影响，当时有个刊物《新左翼评论》，雷蒙·威廉斯从一创刊就是核心撰稿人，该刊大量翻译包括福柯在内的新锐理论家的文章。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于1969出版，威廉斯的《关键词》于1976年出版，这种影响也有迹可寻。可以说威廉斯所说“关键词”与福柯所说“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威廉斯对于“关键词”的定义大致有以下要点：其一，“关键词”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其二，“关键词”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演变的地图；其三，“关键词”的演变体现权力关系。总之，威廉斯将“关键词”理解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穿行，在不同历史语境的转换和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中被形塑的动态过程，而这一点，正是福柯的话语理论所大力揭扬并反复论证的。

个案分析：以“文化批判”为例

威廉斯的上述解析，完全适用于文学理论的“关键词”，这里就以当今文学理论的热门关键词“文化批判”为例说明之。如果将从德国古典美学到马克思恩格斯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今天的文化批判的学术史视为一桩学案的话，那么“批判”概念就是贯穿这桩学案之始终的一条红线。最早是康德建立了“批判哲学”这一庞大的体系，使得“批判”概念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所说“批判”是指学理性的考察、分析和探究。黑格尔自己很少使用“批判”概念，取而代之的哲学话语是“否定”概念。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批判”概念还不足以达到哲学话语的地位。从康德到黑格尔，逻辑显然是向前走的，如果说康德开创了“批判理性”的话，那么黑格尔则建立了一种“否定理性”。二者相比，黑格尔扬弃了康德的知性思维，将“否定”或曰“批判”提升到了辩证思维的高度。马克思的“批判”话语可以说是对于康德的“批判”概念与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的综合，它是在对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进行科学改造的基础上，继承了康德的概念，借鉴了黑格尔的逻辑，将二者加以重铸的结果。而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将“批判”概念运用于社会历史场域，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封建专制制度、变革现存社会关系的利器。“批判”一词在马克思的著述中是一个高频词，而且多部重要著作均以“批判”为名，可见他对于这一“利器”的重视程度。他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学说，将其用于对资本主义现存事物的否定。“批判”一词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说的核心概念，他们力图以此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提出所谓“批判理论”，将矛头直指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存文化。但他们所处的是与其德国前辈们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该研究所的成员大多为犹太籍，且出身于中上等的犹太家庭，加之他们崇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掌权之后，该研究所及其成员便一下子陷入了噩梦。同年3月研究所以“对国家的敌意”的罪名被关闭，财务被没收，图书被查封。5月霍克海默等人被法兰克福大学解聘，接着所有成员都离开了法兰克福，滞留德国的遭到逮捕、监禁、投入集中营甚至被处死，其他成员四散流亡到伦敦、巴黎、日内瓦等欧洲各地，后大多数人又辗转到了美国。当年霍克海默、阿尔多诺等人逃离法西斯铁幕笼罩之下的德国而流亡到美国，面对渗透着深厚商业气息的大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心理落差，阿尔多诺大声疾呼：“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正是这种文化心理落差导致了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严厉批判。

中国学界对于当代大众文化的“文化批判”是随着1990年代的社会体制转型而兴起的，当时遇到两个方面的尴尬，一是对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化转型缺乏心理准备，二是在应对新型的当代大众文化时缺乏理论工具。这种尴尬导致对于大众文化产生很多误判，造成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照搬和套用。这就使之对于当代大众文化的评价总体上是贬抑超出褒扬，排斥胜过接纳，批评多于赞同。晚近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文化批判”的基本价值立场才得以改观，其用法远非此前那样狭仄和僵硬，特别是新世纪十余年来提倡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吸纳和整合各种新兴学科和新潮文类，评价更加公允，心态更加从容，理论更加成熟，“文化批判”已然显示出向相对纯正相对超越的学理探究回归的势头。

总之，“文化批判”概念的内涵是在川流不息的时间过程中不断迭加、增殖起来的，它穿越了两百多年，跨越了众多国家，经过了多个语种的翻译和多种文化的传递，一波三折、山重水复，铸成了今天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词。它就像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可以见出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的影响。由此可见，关键词的成长史其实并无关乎“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争锋，也超越了“厚古薄今”或“是今非古”的分歧，我们原不必在这些纷争中纠缠，需要着重关注的，应是关键词在时光隧道中穿行的轨迹，以及在穿行过程中社会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对它的规定和形塑。

百年中国美学的多维透视

——《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的意义

□左剑峰

20世纪中国美学的内涵异常丰富，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学术与意识形态、精神追求与商业消费等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可以说，其复杂程度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百年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众多知名美学学者发挥己长，展开多向度、多层面和多样化探讨。《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增订本）》（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书，超越了一般美学理论史的写作，即不单纯进行美学史材料的整理和思想理论的内部分析，而追求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在与邻近学科形态的互动中，在不同文化的学术话语的交流中，来考察20世纪中国美学。百年中国美学不仅作为一个历史对象而存在，还与中国美学道路今后该如何往下走的问题密切相关。一部好的美学史必须告诉读者：美学家做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就？他们是如何做的？其做法有何不足？对今天又有何启示？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回答，是此书的首要意义。

《美学的历史》对百年中国美学所取得的各方面成就进行了总结。百年中国美学实际是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过程，同时也是研究领域逐渐开辟的过程。学术的现代转型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美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中国古代有丰富的美学思想，却没有美学。自王国维将西方美学介绍进来后，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我们才开始自觉建设美学学科体系。其二，改变了传统美学那种知觉体验或艺术感悟性质的“发散性”理论话语，转向对思想体系化、理论逻辑性和方法科学性的现代追求。其三，20世纪初的美学家大多对个体自由精神持肯定和提倡的态度，但到了中期这种现代美学精神的转型被中断。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虽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是理性化的集体而非个体。到80年代高尔泰的“感性动力说”、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后实践美学”，充分肯定了审美中个体的突破作用和超越精神，中国现代美学在文化精神上真正走出了古典美学的范畴。

百年中国美学还开辟了心理学美学、文艺美学和审美文化研究等领域。在30年代，朱光潜《文艺心理学》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形态的心理学美学的成熟。在80年代和90年代，心理学美学研究十分活跃，在有关审美心理、创作心理、评介西方理论和阐释中国古代审美心理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1980年中华美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一些学者提出发展文艺美学的构想，以区别于研究审美普遍规律的哲学美学。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美学就文艺的根本性质、文艺的价值功能、文艺的创作和接受过程、各门类艺术的审美特性等问题，展开了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研究兴起。关于审美文化是仅仅研究当代文化还是同时包括古代文化，是以艺术为中心还是反艺术中心，是强调理论体系建构还是注重非体系性的批评等等，存在着不同看法，形成了宽窄不同的审美文化观念。

此外，在译介西方美学、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美学史的书写不仅要肯定美学家所做的贡献，严肃、科学的美学史还必须揭示其中存在的局限。惟其如此，学术研究才有可能进步。对百年中国美学中存在的诸种问题，《美学的历史》进行了严苛、深入的反省和剖析。

首先，现代中国美学家长于在原有思想智慧的基础上进行各种综合，而很少能贡献出一些新的思想元素。即便是相对而言较有创新意味的李泽厚的美学，也只是在发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人化”、“人的对象化”的观点，同时又注入了康德的“主体性”和精神分析学的“集体无意识”等思想。这些理论初看起来好像是中国学人自己的创造，究其实质，都是在演绎别人的思想。

其次，20世纪中国美学在总体上缺乏一种静下心来沉潜下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精神。在前期主要表现为致力于对国民精神状态的改变。中期主要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一种利用，即把意识形态当作树立自己真理权威和攻击不同意见的武器。在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下，个人物质需求的满足、消费欲望、生活享受对学者冲击巨大，成了新的考验。这里面当然有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有很多无奈的历史原因，但学者自身是否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呢？

再次，学者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从西方美学中寻找有关问题的现成答案，甚至热衷于用西方的话语和观念来“翻译”中国古典美学，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家具有与西方著名美学家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以此证明中国美学的存在。可以说，我们还没有找到较好利用民族美学资源的途径，美学理论建构离美学的民族化目标尚有很大距离。

最后，美学研究脱离当下实践。从20世纪初开始，美学理论研究不是回顾古典艺术，就是放眼西方艺术。在中国美学学科建立起始阶段所具有的这一缺陷，在后来竟然成为一种理论习性。不少美学学者对同时期艺术发展、审美现象的关注意识极为淡薄。

《美学的历史》之所以如此严厉地反省百年美学，不是为了否定前人筚路蓝缕之功，而是为了有助于今后中国美学研究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应该走的道路。此书指出了百年美学对今后研究所具有的各方面启示。

中国美学研究要有思想创新意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学习、模仿后，中国美学研究迫切地“呼唤思想”，期待真正地拥有自己的思想。摆脱依附的惰性和自卑心理，树立独立的学术人格，依托个体的审美经验展开创新的研究，已成为我们当今确立学术尊严的必由之路。

中国美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人文与科学的关系。虽然美学研究应关注民族乃至整个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难题，并做出积极的探索和回应，但美学毕竟是一种科学研究。缺乏科学精神，不沉下心去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一定会影响人文思考的创新、深度乃至可靠性。以科学精神推进人文思考，二者紧密结合，才是我们今后所要走的路。

中国美学研究要实现与国外美学的对话。一方面，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努力发掘本民族的美学资源，用本民族的审美经验来丰富全人类的美学。另一方面，应立足于自身民族传统资源去建构“全球性的美学理论体系”，使本民族理论话语和思想智慧，在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美学问题上发挥自身作用。

中国美学研究不能与当下审美实践脱节。长期以来，中国美学研究似乎认为，对古代和西方经典艺术有效的理论就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大大弱化了对当下审美实践的关注热情。今后的美学研究决不能再满足于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应充分关注当下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发展，并及时做出有力回应。

《美学的历史》自问世以来，曾推动学界站在世纪转折点上，回望和反思百年中国美学；同时凭借其在学术深度和致思广度等方面的优势，已然成为学习现代中国美学的必读书和研究该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很多观点已被学界广泛接受。新版增订本重写了部分内容，增加了新的研究材料，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使它更趋完善。新世纪已经走过了近20个年头，文艺美学研究和审美文化研究仍在继续，而环境美学、生态美学、身体美学和生活美学已成为美学前沿领域。我们今后的研究能否充分吸取百年美学的经验教训呢？新的美学研究不应只是话题的不断变换，它能否实现学术品格上的更大跃迁呢？这是《美学的历史》留给每一位读者的问题。

潜江举办章华台诗会

本报讯 6月15日至17日，由第十届湖北潜江国际龙虾节组委会、湖北省作协、江汉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潜江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2019年章华台诗会在湖北潜江举行。臧棣、赵野、张桃州、钱文亮、田禾、车延高、沉河、邓正兵、刘洁岷等数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学者与潜江本地诗人、作家参加。活动期间举行了《潜江诗群》《21世纪两岸诗歌鉴藏》首发式。之后，与会诗人、学者以“穿过平原的河流：诗歌与地理”为题，研讨了潜江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文学地理之间的关系。大家认为，潜江诗人扎根故土、面向现代，不盲目追随新潮，能够在浮躁中选择沉潜，探索属于潜江的独特诗学，不同代际的潜江诗人从不同角度切近生活与时代，诗作在整体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陈泽宇）

《上古迷思》轻松幽默讲述历史故事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旅美作家夏维东的新作《上古迷思：三皇五帝到夏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6月8日，以“三皇五帝的传说与历史真相”为主题的该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学者沙志利、作家秋尘、主持人周微与作者围绕作品展开交流对谈，一同引领读者追寻上古历史扑朔迷离的踪迹。

在《上古迷思》中，作者从“历史的时空”这一自序开篇，以大量历史典籍和考古资料为依据，将“神奇的三皇”“迷离的五帝”“半遮面的夏朝”“写在甲骨、青铜上”等故事进行钩沉拾遗与辨析思考，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进行讲述，将其间的人物和事件生动呈现出来。作品风趣不乏严谨，力求避开了深奥晦涩的理论与佶屈聱牙的行文，带领读者在兴味盎然的轻松阅读中追寻上古历史的迷踪。夏维东表示，该书是他计划推出的“我的五千年”系列的第一部，书中的历史跨度大约为两千年。

连尚文学新晋南京独角兽企业

本报讯 6月13日，“汇聚双创活力，澎湃发展动力”2019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南京分会场启动仪式在南京举行。南京市委常委、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学鹏为年度新增独角兽企业、培育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代表颁奖。连尚文学作为江苏省首家网络文学独角兽企业亮相。自2018年实施“121”战略以来，南京已催生培育了13家独角兽企业、172家瞪羚企业。2019年，南京市新增连尚文学和福佑卡车两家独角兽企业、20家培育独角兽企业以及87家瞪羚企业。连尚文学成立于2017年7月，是以网络文学原创、内容分发、IP转化为主营业务的综合网络文学集团。经过近两年快速发展，现已形成综合性数字阅读矩阵，并不断拓展IP全产业链发展。 （苏 文）

迟小秋推出京剧代表作专辑

本报讯 6月15日，由现代出版社、北京京剧院、王府井新华书店联合主办的《程砚千秋——京剧表演艺术家迟小秋专辑》首发式在京举行。该专辑涵盖了我国当代京剧程派艺术的领军人物之一、京剧表演艺术家迟小秋的10部代表作。

近年来，迟小秋凭借自己扎实的京剧功底和精湛的程派表演艺术，赢得了国内外广大戏迷的喜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专辑收录了迟小秋主演的《锁麟囊》《红鬃烈马》《碧玉簪》《荒山泪》《孔雀东南飞》《窦娥冤》《文姬归汉》《三娘教子》《玉堂春》《宋家姐妹》等10部经典剧目，含10张CD光盘、3张DVD光盘和10册主要唱段曲谱集，并附有全彩剧照剧情歌词集。 （范 得）

川剧《江姐》将赴京演出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30日至7月1日，由重庆市川剧院创排的川剧《江姐》将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向建党98周年献礼。这也是该剧首演以来首次赴京演出。

川剧《江姐》取材于小说《红岩》。上世纪60年代初，成都市川剧院根据剧作家阎肃的歌剧《江姐》剧本改编并排演了川剧《江姐》，成为川剧红色经典剧目。此次的新版川剧《江姐》由重庆市川剧院创排，自去年首演至今广获好评。该剧通过对江姐革命工作的生动描绘，展现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既讴歌了其临危不惧、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又抒写了她深厚的同志爱、夫妻情和对革命后代寄托的无限希望。

《江姐》由当代中国川剧领军人物之一、“梅花大奖”获得者沈铁梅领衔主演。该剧将力求突破以唱为主的表现形式，强化戏曲的逻辑语汇和传统美学，让剧目回归戏曲本体。

琥珀四重奏讲演音乐会展现经典魅力

本报讯 6月16日，由国图艺术中心与中央音乐学院·琥珀四重奏共同推出的“沉淀青春 听读经典——琥珀四重奏讲演音乐会”系列活动之第一场在京举行。音乐会以“穿越300年——弦乐四重奏版极简古典音乐史”为主题，甄选多部中外经典乐章，并通过讲演结合的方式阐述经典背后的故事，破译音乐之中的奥秘，打造了一堂古典音乐“科普课”。近年来，中央音乐学院·琥珀四重奏经过深度思考和多场演出实践，打造出集室内乐音乐会和音乐公开课于一体的“讲演音乐会”，旨在推广古典音乐、提升观众音乐素养。同时，此次活动是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2019年中关村国际青年艺术季的支持项目之一。本届艺术季于今年6月至8月举办，以“筑梦青春奋斗史，英雄遍地中关村”为主题，力求打造当代青年文化高地，展现文化精神的价值引领，迎接新中国70华诞。 （海 雯）

李进祥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协副主席李进祥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6月18日在银川逝世，享年51岁。

李进祥，中共党员，回族。1998年开始发表作品，200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孤独成双》《拯救者》《亚尔玛尼》，小说集《换水》《女人的河》《换骨》《生生不息》等。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国戏推出实验京剧《归途》

本报讯 6月5日至6日，实验京剧《归途》在中国戏曲学院小剧场上演。深沉浓烈的人物情感、颇具视觉冲击的舞美、新颖别致的唱腔设计，深深感染了在场观众。

《归途》取材自唐传奇《李娃传》，并对其进行了改编创新和演绎。该剧主创团队由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组成，是该院“研究生跨系部联合创作”推出的小剧场剧目，编剧胡铭帅、导演吴烨华、制作人丁一丹均为来自不同系部的研究生。全剧以当代青年视角诠释传统文学人物，展现了主人公郑元和在人际关系中的挣扎、在追寻自我价值中的上下求索，体现了国戏研究生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能力。主创团队表示，该剧还将继续打磨加工并向社会推广。 （戏 闻）